

张恨水

燕世超 / 著

论



ZHANGHENSHUI LUN
安徽大学出版社



张恨水论

燕世超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铁四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46 千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 册

责任编辑 朱寒冬

封面设计 鲁榕

ISBN 7-81052-129-2/I·14 定价 1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 言

以往的文学史大多是纯文学史，以往的文学理论大多是以纯文学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理论。80年代以来，通俗文学勃兴，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对通俗文学的研究始成为当务之急。本书就是这样一个不一定成功的尝试。它以对张恨水及其作品的研究为主，辅以其读者研究和比较研究，构成本书的基本框架。必须指出的是，对与本书有关的某些已成定论的观点，作者看法与之相同或相似者，不愿作重复性的劳动，这样，这本小书就难以形成一个比较严密的体系，这是本人深感歉疚的。

在第一部分“作家论”中，鉴于有关张氏生平事迹的专著早已问世，这里仅在其“创作道路”和“新闻生涯”两文中作一概述。中间几篇分别论述张氏某一方面，其中有不少内容与读者方面有关，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研究作家不可能完全抛开读者。最后一篇论述张氏对章回小说的改良，意在客观把握他对通俗文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第二部分为“作品论”，这里仅限于小说方面，不包括其散文与诗词。因为如果追求面面俱到，则不免浮光掠影。这一部分又分两个小类，一类是对其小说的某一方面作宏观把握，另一类主要是对其人物形象作微观分析，尤以对其频频出现的新旧兼备的知识分子、小市民和下层妇女形象的解剖为重。

第三部分为“读者论”。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作家→作品

HA 10/03

→读者”这样一个动态流程，尤其在像张恨水这样以卖文为生的作家那里，三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更为显著，张恨水小说热的每一次兴起都暗合了读者的期待。鉴于张恨水小说读者研究方面的文章极少，这里觉得有列入专章讨论之必要。

第四部分“比较论”分为作品比较与作家比较。从第一篇中多少可以看出张恨水与鸳鸯蝴蝶派的渊源关系，从第二篇中又可以发现把30年代中期的张恨水仍归入这一流派是多么牵强，从第三篇中可以部分体会出通俗文学与纯文学功能的差异，最后一篇意在让读者领悟到张恨水的人格力量。

要做的事情很多。在张恨水研究中，本书所做的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况且限于作者的才识学力，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恳望读者赐教。

作 者

1996年8月于合肥

目次

前言 (1)

◀作家论▶

- 张恨水的创作道路 (2)
张恨水的新闻生涯 (9)
张恨水的创作动机 (15)
张恨水的创作态度 (19)
由“赶上时代”说开去 (23)
张恨水对两种文化的反思 (27)
张恨水是否属于鸳鸯蝴蝶派 (31)
张恨水对章回小说的改良 (38)

◀作品论▶

- 张恨水言情小说的创作模式 (52)
转化中的张恨水小说 (56)
历史在向你苦笑
——论杨杏园形象的悲剧意义 (60)
传统美德的艺术范本
——论张恨水前期小说的美学价值 (63)
正义而徒劳的反抗 (68)

人性的堕落

——唐家母女性格扭曲的历程 (74)

奇怪的人生二律背反定律

——论张恨水言情小说中扭曲的下层人物形象 (78)

人类心灵的永恒冲突

——《大江东去》中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探析 (82)

张恨水——现代讽刺小说大家 (89)

两部独具特色的乡土小说 (98)

◀ 读者论 ▶

二三十年代的张恨水现象 (114)

谓有源头活水来

——张恨水对读者状况的调查分析与创作转向 (118)

两次张恨水热——从宗教到历史 (123)

◀ 比较论 ▶

《广陵潮》与《春明外史》 (130)

《夜深沉》、《骆驼祥子》及其作者 (144)

文学的两极

——从与鲁迅的方方面面比较中看张恨水 (150)

人生坐标点的位移

——张恨水与张资平之比较 (157)

附录一 当代张恨水研究成果述评 (165)

附录二 第二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综述 (169)

附录三 张恨水与中国通俗文学研讨会综述 (174)

作 家 论

如果说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力作用的结果，那么张恨水大约可以算得上多种力的一块合金。他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又不断地向新文化汲取养料；他受中国文化滋润成才，却能够放开眼光，把外来优秀文化吸收并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中；他要保持一个作家的独立意识，又在不断追随时代潮流；他灵魂深处积聚着浓厚的人文精神，却又常常被文化的商品化所困扰。然而，他终于靠自己辛勤的努力走出一条成功的文学道路，他不断地实现着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

张恨水的创作道路

每个人来到世上能够做出什么事业，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缘份。少年张恨水在深谙武功的祖父去世后，失去了习武的条件。11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他读到了《残唐演义》，从此对小说爱不释手，不管搜罗到什么小说，便如饥饿的人伏在面包上一样，尤其对言情小说更是到了如痴入迷的程度。

父亲突然病故，家道中落，寡母只好带着他和弟妹们从南昌回到了故乡安徽省潜山县。秀奇的天柱山启迪了他的智慧，清丽的皖河水滋润了他的心田，“孔雀东南飞”那优美凄惨的故事震撼了他的心灵。他对小说更加钟情了。他常常独自一人呆在自家一所高大的黄土屋子里，与父亲遗留的和自己积攒下的几大箱古书作伴，或作诗自娱。他生来不是务农的料，对自家的田园耕作毫无兴趣。在乡邻当中，他也没有什么朋友。这种环境使他很快赢得一个“大书箱”的雅号，这和“书呆子”之意相差无几。他干脆给自己的房子命名为“黄土书屋”，又自书“就这样做”四个字置之案旁座右。就是在这命运多舛的青少年时代，他的古文功底打下了异常坚实的根基，他对小说也由疯狂的迷恋进入“准创作”阶段。

23岁时，他的忘年交郝耕仁来找他外出游览。他们幻想以买药卖药来解决路费之需，但幻想并不等于现实，兵乱迫使他

们折价卖掉所有的药品半道而归。然而，一路的见闻及郝耕仁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使他受益非浅，许多年后仍对此记忆犹新，这无疑是他以后独自踏入人生旅途的一堂预修课。

他又回到了“黄土书屋”，那几箱古书自然又成了他的“梅妻鹤子”。乡邻中有人说，读书要读到张恨水这个样子，那还不如让孩子去放牛呢。再加上不幸的婚姻给他套上的又一重精神枷锁，使他无法忍受，很快便悄然离开了。从此之后，他开始了漫长而多产的新闻与文学生涯。

在张恨水的文学生涯中，1924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他长达百万言的《春明外史》开始在《世界晚报》连载，并使他一举成名。小说主人公杨杏园是一位怀才不遇、流落京华的青年记者。他真诚地爱着雏妓梨云，可梨云不幸染病夭折。在心灵创伤尚未愈合之际，他爱上才女李冬青，冬青却因身患暗疾而不能与之婚配，便借口南行来减轻感情上的折磨。行前，他把好友史科莲介绍给杏园，却遭到富有个性的史的拒绝。杏园遂看破红尘，遁入佛门，在身心交瘁中撒手西归。小说对当时的官场丑闻等黑暗现象作了大量的披露和辛辣的讽刺，在北平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以致许多人每天下午提前两个小时在报馆门口排队，为的是先睹为快。

就在《春明外史》的写作过程中，他的被誉为“民国红楼梦”、亦长达百万言的《金粉世家》开始在《世界日报》连载。小说以平民女子冷清秋与国务总理金铨之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反目、离异为主线，描写了豪门贵族金铨一家醉生梦死、荒淫糜烂的生活。小说最后以金铨暴死、家道陡衰、金太太遁世学佛作结。《金粉世家》引起的轰动一点不亚于《春明外史》，以至在好多年之后，一些知识女性见了张恨水，仍以其中的一些细节见问。

1930年《啼笑因缘》的问世，使几乎各个阶层的读者都疯狂一时，樊家树所体现的人类那种纯真高尚、至善至深的爱情尤其令许许多多大、中女学生如醉如痴。张恨水用他那卓越的结构技巧、娴熟的性格塑造手法和高超的语言艺术把一幕幕爱情的悲喜剧铸入读者的灵魂深处，也意外地使作家本人久已干涸的心田滋润了爱情的雨露——一位春明女中的少女回报了他刻骨铭心的爱。

在张恨水多达上百部的小说中，大多是言情小说。他写尽了那个时代两性之间在黑暗势力摧残下生生死死的苦情、哀情，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爱得死去活来的思情、痴情，以及经过严峻考验和抗争终成眷属后如胶似漆、如颠若狂的欢情、喜情，唯独没有低级下流的艳情、色情。言情小说的巨大成功使他得以跻身于我国现代著名作家之林，也使他成为我国通俗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虽然言情小说创作贯穿于张恨水文学生涯的每一时期，但在三四十年代，他的主要精力却集中在反映国难民艰的创作上。早在30年代初，张恨水便产生了创作要“赶上时代”的动机。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有二，一是“九一八”事变，二是1934年的西北之行。

人生获得知识的途径，不外是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后者作为丰富的生活阅历有时更显重要。张恨水的西北之行就是如此。当初为了了解西北，他自费前往郑州、洛阳、潼关、西安，最后到了兰州。原计划要去新疆的，终因某些人为的因素未能如愿。

这次西北之行使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感受。他无心游山玩水，而是“看动的，看活的，看和国计民生有关系的”，所以，使他受益最大的乃是对西北人民

苦难状况的了解。他的灵魂深处被深深地震撼了：“你不会听到说，全家找不出一片木料的人家；你不会听到说，炕上烧沙当被子盖；你不会听到说，十八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你不会听到说，一生只洗三次澡；你不会听到说，街上将饿死的人，旁人阻止拿点食物救他（因为这点救饥食物，只能延长片时的生命，反而增加将死者的痛苦）……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

西北归来，张恨水创作了《燕归来》和《小西天》两部长篇小说，详细描述了彼时西北人民的苦难生活。从那时起，他的思想和创作确实变了。他赶上了时代，创作了许多反映国难民艰的作品，成为一位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进步作家。他所任职的《新民报》也因此成了为老百姓说话、为人民大众所欢迎的舆论阵地。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张恨水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爱国主义的情怀。五四运动时，张恨水在芜湖《皖江报》任职。当时有一队日本兵在芜湖街上示威，对中国人民大加污蔑。张恨水闻讯后，毅然率领报馆20多名员工组成一支小小的游行队伍，高呼抗日口号。30年代，日本军官土肥原极力笼络中国各界知名人士，曾托人带上《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各一部，请张恨水“赐予题签，藉留纪念，以慰景仰大家之忱”。张却把他歌颂义勇军抗日的小说《啼笑因缘续集》写上“土肥原先生囑赠”送给他，并不署姓名，以示嘲讽。在上海时，华北日伪政权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张恨水正欲北上，这时接连收到家人3封急电，告诫他勿要北归，原来他已被列入“黑名单”。于是，他来到南京。不久，南京危急，他转赴重庆。途经故乡时，他

当众揭发一个曾有惠于他的汉奸，并号召民众起来抗日。他身体力行，给政府有关方面写信，要求准许他回故乡打游击；当这一要求未被批准时，他又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拿出来资助胞弟打游击。在重庆8年，他把《新民报》当作抗日的讲坛：他开辟了“最后关头”这一栏目，发表抗日稿件，并带头撰写了大量抗日杂文，痛斥大后方的腐败、误国行为。撇开张恨水大量的国难小说不算，这些事迹足以说明，他已经站在抗日的最前列了。抗战开始，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届理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给1000位各界爱国人士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张恨水就是其中的一位。在1994年10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代表认为他是一位爱国文化名人，这是确有证据的，是对历史的尊重。

在重庆郊外几十里有个地方叫南温泉桃子沟，周围全是大大小小的山峰。抗战期间，一大群穷公教人员就被疏散到这里。这其中有6间茅屋，是一个朋友借给张恨水住的，讲明不收房租，只须修缮。张恨水用不完，便分出3间给另一个公教人员住。

同别人的房子一样，张恨水的房子也是用竹片和泥巴糊成墙，屋顶也是用活木架着梁柱，竹片、茅草铺在上面。狂风时常卷走屋上茅草，大雨降临前，他就把全家的盆盆罐罐一齐排在缺草的屋顶下，等待雨水下漏，张恨水戏之曰“待漏斋”。每当此时，他使用破布盖住那张写作的“方舟”，把成堆的稿件放在安全区——床上，家人则各自躲雨。

“待漏斋”里的创作条件真是艰苦极了。除了躲避敌机的空袭外，张恨水早上要走18公里山路上班，傍晚常背着平价米回家。每当此刻，妻子周南总是带着孩子在山路上迎接，待四目相对时，她总是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那一声叹息里该蕴藏着这对夫妻间多少忧虑，多少深情啊！

平价米的价格虽然低廉,但里面至少有十分之一的砂子、秕谷等杂物,张恨水常常戴着老花镜与家人一同挑拣,很费时间。即使如此,做出来的饭还是难以下咽。炎热的夏夜降临,这一带小得肉眼难以看见的黑蚊子便越过门窗肆虐了,它咬起人来又毒又痛。为此,他只得裹紧衣服,并把双脚泡在水里。冬夜,没有御寒的炉火,他穿着破袜子、单鞋,只好一边写作一边与寒冷搏斗。他的纸张用铅笔一戳就破,用毛笔则浸湿桌面。即便如此,他还常常为维持家人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度而发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每天至少要写出3000字的稿子来。3000字,在20年代,对张恨水来说是毫不困难的,然而此时此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却是“榨出来的油”。

抗战8年,就在这极其简陋的茅屋里,20来部小说连同散文共计800多万字的作品问世了。它们热情讴歌了前方将士,尤其对我们民族发生国难之因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对黑暗现象大加挞伐。它们是我国国难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民族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1948年12月,因北平《新民报》内部矛盾,张恨水辞去了该报的经理工作。一向忙忙碌碌的人一下子变得清闲了,心理上自然很不平衡。回首往事,“人生几十年光阴,像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过去”。于是,他应邀写了《写作生涯回忆》,在《新民报》上连载。

有些作家大名鼎鼎,其作品思想也很激进,可其回忆录参考价值并不大,因为夸大其辞甚或无中生有比比皆是。张恨水这篇6万多字的回忆文章却是研究他本人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它客观地叙述了本人的创作历程,从不讳言当初的所作所为。譬如对他早年是一个“礼拜六派的胚子”的解释,对出售一些书稿版权、拿取稿费的说明,都十分真实可信。这些在当时只

能是给自己脸上抹黑的文字更体现出他为人的诚实和正直。

不久,《新民报》新任领导人在该报撰文说张恨水是国民党特务。他没有料到自己服务了多年的报纸竟然反过来骂他,人格的侮辱、自尊心的伤害使他痛苦不堪。加上其他方面的不幸打击,他气上加气,得了脑溢血。这次重病几乎摧垮了他的身体,有好几年时间,他嘴角流涎,语言迟钝,他的写作完全中断了。也许是身体的底子好,也许是上帝的赐予,他终于奇迹般地恢复了。医生惊叹说像他恢复这样好的病人百无一个。

他又恢复了写作,像过去那样不知疲倦地工作了。他有自知之明,像二三十年代那样创作自然是力不从心,于是,他干起了改编工作。几千年来,民间流传着多少优美的爱情神话,多少悲惨的爱情传说,他要把这些故事重新整理和描绘出来。有关的版本尽可能搜集,可参考的书籍尽可能参考,以确保翔实无误。《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牛郎织女》、《孔雀东南飞》等十几部中篇小说接连问世了,它们是张恨水留下的最后一笔文化遗产。

1959年,爱妻周南病逝,张恨水一下子衰老了。他终日呆坐家中,极度伤感、寂寞。几年后,适逢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为了防止红卫兵抄家,他含泪把自己毕生心血的结晶——那些小说分发给儿女们保存。1967年农历正月初七,73岁的张恨水因脑溢血重发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张恨水的新闻生涯

张恨水生前多次对他的子女说，他的职业是记者、编辑，写小说仅是其业余活动。这倒不是过谦之词，因为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他就在新闻界尽职，直至解放前夕。在长达30年之久的新闻生涯中，他既当过校对、驻京记者、通讯员、助理编辑、编辑，又当过副刊主编、主笔、总编、经理和社长。可长期以来，他在人们心目中只是一位通俗小说大家，而在新闻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则知之甚少。鉴于此，本文拟就其新闻生涯作一概述。

青少年时代的张恨水在丧父失学后，为了生存曾四处奔波：随流动剧团跑龙套，在汉口为某小报补白，特别是随当记者的挚友郝耕仁的一段流浪小史，丰富了其社会阅历。在一个西风起、北雁南飞的日子，大病初愈的张恨水卖掉唯一可以御寒的夹衣，只身从上海回到了故乡安徽潜山。故乡人没有给予他安慰与鼓励，讥笑与嘲弄迫使他一头钻进古文中。他我行我素。

终于，机遇来了。芜湖《皖江报》要郝耕仁去当总编辑，郝因事缠身，愿把这一职位让给张恨水。残冬过后，他凑了3元路费，来到芜湖。

《皖江报》属于地方小报，人手少，消息闭塞，除了本埠新闻，全靠剪他报材料充实版面。张恨水的任务是每天写两个短评，编一版副刊。在此之前，短评和副刊也用的是剪刀，张恨

水不肯这样干。他爱的是言情小说创作，就在上面刊登自己的新作《紫玉成烟》和《南国相思谱》并自写短评，这在当时无疑是破天荒的。老板谭居停爱他的短评，居停太太则爱看他的小说，报纸开始有人投稿，社会效应扩大了，张恨水的影响也随之扩大了。

又到了秋风萧瑟的季节了。早年失学的痛苦时时袭上他的心头，闭塞的内地关不住他的雄伟抱负。终于有一天，他踏上北去的列车，来到了北京。

他本来是想去北京大学读书的，可老天偏不从人愿，他必须先找一份工作，解决吃饭问题。这时，朋友介绍他到上海《申报》驻京记者站工作，每天发4条新闻，同时兼任北京《益世报》助理编辑。次年，因高声朗读英语得罪了老板娘，又被改任天津《益世报》驻京记者。工作时间分别是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至6点和夜里10点至次日6点。休息时间少而零散，去北大读书只能成为他不可企及的梦想了。

他是个孝子，深知寡母带着5个弟、妹度日之艰，他可以想象家人盼他挣钱接济已是望眼欲穿。他要对得起死去的父亲，要挑起养家的重担。这样，他只有自我加压。1921年，他又兼任芜湖《工商日报》驻京记者；后来，又任“世界通讯社”总编，数月罢去，又给上海《新闻报》和《申报》写通讯，为的是这两家报纸甚丰的稿酬；再往后，又协办“联合通讯社”并兼任《今报》编辑。几年来，为了养家，他不但没进北大，连自己心爱的文学创作也搁笔了。

“世界通讯社”没有外勤记者和邮电通讯，材料过去全靠社长茶余酒后与人聊天得来。张恨水无论为哪家新闻单位服务，都抱定“不拆烂污主义”，决不把可有可无的材料敷衍成篇。为此，他常常先去搜寻材料，然后再加工整理。就在这繁忙的新闻工

作中，他练就了一套硬功夫。他曾不无自豪地回忆道：“这两三年来，天天的新闻文字，要写好几千字，笔底下是写得很滑了。只要有材料，我可以把一篇通讯处理得很好，而且没有什么废话。”（《写作生涯回忆》）假若要给张恨水的新闻生涯分期的话，以上（1918—1923）可视为其初创阶段。

1924年初，张恨水辞去了在京的所有职务。该年4月，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社，张恨水应邀为其编新闻，并在其副刊上连载小说《春明外史》。不久，副刊改由张恨水接办。次年，成舍我又创办了《世界日报》，其副刊《明珠》仍由张恨水编辑，小说《金粉世家》亦在此连载。这两部小说皆长达百万字，为张恨水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它们在文学上的空前成功给《世界晚报》社和《世界日报》社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和社会反响。除此之外，张恨水还有许多作品在这两家报纸上发表，均反应良好。

张恨水在新闻与文学上的双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者嫁接的结果：报纸成了他小说的载体与媒介，又因而获得经济与社会的双重效益。张恨水成了《世界晚报》社和《世界日报》社的台柱子与摇钱树。

如果说张恨水仅仅因小说写得好而使报纸受益，那至多只说对了一个方面。作为一个事业心极强的报人，他为这两家报纸的发展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在回忆创办《世界晚报》时，张恨水曾深有感触地说：“我和龚君，都是为兴趣合作而来，对于前途，有个光明的希望，根本也没谈什么待遇……这与写作好像无关，其实关系很大，因为我们决不以伙计自视，而是要共同作出一番事业的，所以副刊文字和小说，都尽了自己能力去写。”（《写作生涯回忆》）

那时，张恨水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他很想挣钱，想增加收